

馬爾薩斯的庸俗經濟學是凱因斯主義 偽科學的一個主要理論基石

黃 仲 熊

(一) 引 論

凱因斯主義是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為壟斷資本服務最賣力氣的一種典型的庸俗經濟學，這種披着“科學”偽裝的辯護論體系，不僅反映出它的社會根源——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的一些外表上的特點和壟斷資本的要求，而且也從理論淵源上反映出，它是一種搜羅拼湊從19世紀以來許多庸俗經濟學標本的雜蒼。凱因斯的一生除了擔任許多重要的反動職務直接為帝國主義和壟斷資本服務而外，他的最重要的“理論”工作，便是孜孜不倦地從以往庸俗經濟學和庸俗社會學的廢墟中，尋覓殘磚剩瓦來建立一座維護壟斷資本主義的“理論大廈”。他在1936年完成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這一著作，可以說是這座“大廈”的主要建築。

由於凱因斯的這一著作具有一種矯揉造作的邏輯結構，一種撲索迷離的外觀，因此在它問世以後的最初十年中，曾經在資產階級經濟學界攪起了一陣渾水，但是當資產階級的學者們逐漸弄清了凱因斯的真正意圖以後，這一陣渾水便基本上澄清了。因為許多派別的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們，都逐一地在凱因斯的“神廟”中發現了自己祖先的牌位，於是他們心安理得，萬眾歸宗地把凱因斯當作自己的偶像來膜拜，凱因斯主義很快地成了20世紀無產階級經濟學的新正統。

但是凱因斯的“理論”建築，除了各種派別的庸俗經濟學的殘磚碎瓦而外，也從19世紀的庸俗學者中找到了主要的奠基石，20世紀凱因斯主義的新正統其實不過是19世紀馬爾薩斯庸俗經濟學舊傳統的衣鉢繼承人。從凱因斯在資產階級經濟學界初露頭角時起，便萬分景仰馬爾薩斯。並開始極力宣揚馬爾薩斯的傳統。凱因斯本人是從英國典型保守的資產階級學府劍橋大學出身的學院派經濟學者，他從本世

紀20年代起，便一心想發揚所謂劍橋學派的“真正傳統”，來反對以非學院派出身的里加圖的古典經濟學。他從劍橋的“傳統”中，找到了反對里加圖體系最力的反動經濟學家馬爾薩斯，把他尊稱為“劍橋派的第一位經濟學大師”^①。

凱因斯在1933年出版的“傳記集”中，為馬爾薩斯寫作了長篇傳記，在引證了馬爾薩斯的許多整段的著作和以前未發表過的書信之後，不勝感慨地寫道：“假若整個19世紀以來的經濟學不是按照里加圖的傳統，而恰恰是依照馬爾薩斯這一個幹流來發展時，那麼我們今天就會處在一個更加智慧更加富庶得多的世界！”^②他還惋惜馬爾薩斯經濟思想的“長期埋沒無聞和里加圖思想在一百年來的絕對統治，是經濟學發展中的災難。”^③

凱因斯追隨馬爾薩斯的傳統主要表現在三方面：第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歐洲許多國家燃起了革命的烽火，凱因斯這時還只是在資產階級經濟學界初次露面，便立刻找到了馬爾薩斯的反動“人口理論”，當作代表資產階級向革命的工人階級示威的武器。他極力推崇“人口論”，把它說成是“深刻的英國人文科學的傳統——……這個傳統以熱愛真理，最高貴的明淨，以擺脫感情用事或形而上學的平凡的純潔，以最無私情和公益精神為標志”^④。第二，在戰後世界經濟危機泛濫的年代，凱因斯企圖創立保衛壟斷資本主義的“理論體系”，開始完全遵循馬爾薩斯的途徑，以庸俗的供求理論來反對里加圖的勞動價值理論，利潤論和資本積累理論，剽竊馬爾薩斯的“有效需求”論當作自己理論體系的基石。而凱因斯在這裏的最明顯的目的，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是要通過反對里加圖的勞動價值論來“擊潰”馬克思主義的基礎。第三，和馬爾薩斯在19世紀所做的那樣，凱因斯也企圖以擴大“有效需要”的手段來“克服”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他認為：“馬爾薩斯後期關於有效需求不足這個概念，作為對失業的科學解釋，取得了確定的地位”^⑤。而所有這三方面，也表明了，凱因斯是遵循着馬爾薩斯的庸俗經濟方法論的總的傳統，凱因斯極力讚美馬爾薩斯的方法論。

① 凱因斯：“Essays in Biography”，1933，P. 95.

② 全上引，頁144.

③ 全上引，頁141.

④ 全上引，頁120，譯文見：“馬克思恩格斯論馬爾薩斯”（三聯），頁41。

⑤ 凱因斯：“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英文版），頁362。

凱因斯抬出馬爾薩斯的舊傳統來加以改頭換面，其目的何在，是很顯然的。帝國主義者壟斷資本家亟圖從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絕望的矛盾中掙扎出路。在危機泛濫的洪流中掙扎時，他們要撈住一切最反動的枯枝朽木來救命。而在一切庸俗經濟學中最反動的馬爾薩斯的庸俗學說，似乎是最能滿足今天的帝國主義者的要求。因此在今日的資本主義世界中，出現了各式各樣的馬爾薩斯主義者。其中搬弄反動人口論的新馬爾薩斯主義是第一股反動的逆流，而以“克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爲使命，以擴軍備戰作爲發展“有效需求”的主要手段的凱因斯主義，是馬爾薩斯的另一個最重要的再版。也許一個英國的進步經濟學家所說的話並不是誇大的，他說：“如果19世紀初期的社會鬥爭，基本上可以歸結爲馬爾薩斯與加里圖之間的爭論，那末把我們這個時代的社會鬥爭，歸結爲馬爾薩斯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的鬥爭也許是恰當的”^①。

因此，我這篇論文雖然主要是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來闡述凱因斯與馬爾薩斯的庸俗經濟學之間的繼承關係，但是批判的鋒芒是指向現實鬥爭的。凱因斯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當前大敵。正如美國共產黨領袖威廉·福斯特所指出的：凱因斯主義“無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強烈地向馬克思列寧主義挑戰”^②。因爲它不僅直接向壟斷資本主義獻策，而且用種種幻想來迷惑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給他們制造一種錯覺，彷彿凱因斯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良好的替代品”。非常明顯，近年來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學界流行着這樣一種傾向，就是儘管凱因斯本人曾強烈地誹謗反對馬克思主義^③。但是凱因斯的信徒們卻力圖從凱因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尋找“共同”之處，企圖玩弄魚目混珠的把戲。特別是當修正主義者和右派向黨猖狂進攻的時候，我國右派經濟學者的首領陳振漢等，竟妄圖以凱因斯主義來篡奪馬克思主義。這樣看來，對凱因斯主義的鬥爭不僅應該充分揭露這種“理論”在實際上的危害性，而且應該徹底揭露它的反科學性，證明它不但和馬克思主義之間毫無共同之點，而且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反科學的庸俗經濟學。

① 羅納德·米克：“馬克思、恩格斯論馬爾薩斯”（三聯），頁43—44。

② 威廉·福斯特：“爲反對凱因斯主義而鬥爭”。美國經濟論文選（世界知識出版社）。

③ 凱因斯曾經鄙地污蔑“資本論”爲“科學上錯誤的，對現代世界毫無益處或應用意義的陳腐經濟教科書。”“勸說集”（1932）300頁。

(二) 凱因斯和馬爾薩斯的反動“人口理論”

凱因斯在理論上的庸俗性和反動性，是從他在資產階級經濟學界初露頭角的時候，便和馬爾薩斯結下了不解緣。我們知道，馬爾薩斯在資產階級經濟學中的特殊地位，首先是由於他在1798年所發表的“人口原理”這一著作所形成的，這並不是一種嚴格的經濟學的著作。馬爾薩斯在因“人口論”出名之後，才開始發表一系列的政治經濟學方面的著作，其中的主要代表作是在1820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原理”。馬克思對他這兩部庸俗的書都作過尖銳的批判，特別是對於“人口原理”，馬克思指出：“那部小書會名噪一時，全是由於黨派利害的關係，裏面沒有包含一個創造性的命題，只是對前輩已有的類似庸俗觀點，加以小學生樣淺薄的，牧師般改頭換面的剽竊”^①。馬爾薩斯寫“人口原理”的時期是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時期，也是英國產業革命的時期。當時的英國勞工由於資本主義的剝削加強，也由於戰爭時期的人禍天災，他們的貧困成了最著目的社會問題。同時受到法國革命的影響，在英國的進步知識界中，也出現了社會改革的激進思想，攻擊私有制度，因而在勞動人民中起了一定的影響。^②馬爾薩斯寫“人口原理”的動機，正是看到這些思想對於資產階級的危險性，於是堅決站在維護有產階級利益的立場，重複過去早已有人提出過的最膚淺的“經濟原因”（人口“過多”和食物“不足”），來企圖防止這些“危險”思想在勞動人民中的傳播。

與此相似：凱因斯是在第一次大戰時期開始在英國經濟學界活動的。在第一次大戰中，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矛盾，以空前的破壞力爆發了出來，加以戰爭的創傷，使歐洲大陸的經濟生活在戰後陷於普遍飢饉與支離破碎的狀態、糧食缺乏、生產停頓、交通和市場癱瘓。在戰爭結束時，據資產階級官方估計，歐洲

① “資本論”（人民版）卷一，頁774。

② 英國進步思想家高德文受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在1793年發表了“關於政治正義及其對一般的德性與幸福的影響之研究”，法國的社會主義思想家康多塞也在1794年發表了“關於人類精神進步之歷史的考察”一書。兩部著作都強烈地攻擊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的罪惡。高德文並主張廢棄政府和法律。他們的書在英國當時的勞動人民中非常暢銷，引起英國統治階級的極大憂慮。

大陸至少有一千五百萬個家庭靠領失業救濟金爲生。而特別使資產階級感到震驚的是，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巨大影響，在當時大有引起燎原之火的趨勢。德國、奧地利、匈牙利，意大利等許多國家中工人階級的革命力量，正在直接沖擊着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政權的基礎。正如列寧在當時所指出的：“在帝國主義時代，尤其在大戰後的現在，當各民族已飽受戰爭痛苦而迅速認識真實情況的時候……在全世界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的影響下，在一切國家內都有無數火花到處橫飛”。全世界的“資產階級爲‘布爾塞維克主義’所嚇倒”^①。他們比之馬爾薩斯時代的英國資產階級對於當時進步思想的畏懼更感到驚恐萬倍。在這種革命高潮的年代，這個被列寧稱之爲“彰明較著的資產者、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無情的敵人”的凱因斯，也就如百年前寫出“人口論”的馬爾薩斯那樣，在1919年寫出了第一部使他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成名的著作“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後果”。

在這部著作中，凱因斯第一次顯露了他作爲馬爾薩斯的繼承人所具有的那種庸俗的“天才”，請看他在當時是如何揮舞着馬爾薩斯主義的骷髏向歐洲革命的工人階級“示威”吧！他一開始便根據他所認爲的，從1870年以來歐洲人口增長的數字與食糧增加情況加以對比，以此來說明社會不安定的原因。特別企圖證明二十世紀初期以至第一次大戰，馬爾薩斯主義的僵屍正在復活。比如他寫道：“馬爾薩斯曾經發現了一個魔鬼（指人口過剩——筆者註），在前半世紀的所有重要經濟著作中都清晰地談論着這個魔鬼，在第二個半世紀中，它被鎖起來消失不見了，可是現在我們又重新解除了這個魔鬼的鎖鍊”^②。他也企圖證明作爲馬爾薩斯主義唯一所謂理論根據的，莫須有的“報酬遞減規律”在戰後的歐洲重新起支配作用。^③認爲人口增長是引起“重大歷史事變”的“基本經濟原因”之一，^④從而竟至荒謬到把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也歸咎於俄國“人口數目的膨脹”，認爲革命爆發受這方面的影響，“要比受到列寧和沙皇的影響深遠得多”^⑤。

① “列寧文選”兩卷集，卷二，頁762。

② J. M. 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New York, 1920, P. 20.

③ 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PP. 10, 25, 254—55.

④ 全上書，頁14—5.

⑤ 全上書，頁15.

凱因斯當時一方面警告資本主義世界的統治階級，應當注意由於所謂“人口壓力”所造成的“當前危險”已經是一個生與死，飢餓與生存的搏鬥”的嚴重問題，是關係到所謂文明世界的存廢的問題，因為“歐洲人口的生活水平迅速地向着真正的飢餓點下降（俄國已經達到這點，而奧國正接近於這點），人們一般總是不願意平靜地死亡。帶來麻痺和絕望情緒的飢餓，會驅使人們陷於歇斯特里亞的神經不安和瘋狂。在痛苦中的這些人們，爲了拼命企圖填補個人的迫切需要，可能導致顛覆或淹沒文明制度的一切”。凱因斯認爲這正是必須動員一切“資源、勇氣和理想來合力進行抵抗的危險”^①。但是另一方面在恐懼的心情下，凱因斯又不能不在馬爾薩斯主義中，爲資產階級統治者和他自己驚恐不安的醜惡靈魂去尋找到一種自欺欺人的“鎮靜劑”。因爲馬爾薩斯在談到他的反動的“人口理論”時寫道：“如果這些真理（指馬爾薩斯所捏造的人口與食物的關係）傳播開來，……那麼所有的下層民衆就會更加安分守己。他們在缺少麵包時也不會那麼容易決心暴動；那些誘惑人的煽動圖書就不容易把他們煽動起來，因爲他們懂得：要想依靠革命來提高工資和家庭生活費是沒有多大希望的……”^②凱因斯在他的上述著作中也採取了和馬爾薩斯同樣的反動說法，企圖對當時歐洲燃燒起來的熊熊的革命火焰，拚命澆潑冷水，他這樣寫道：“對付政治上的暴虐和不公平，革命確實是一種武器。但是對那些不是由於分配不均，而是由於普通的經濟貧困所致的受難者來說，革命難道能夠提供什麼有益的希望嗎？防止中歐各國爆發革命的唯一保障，就是甚至從亡命之徒看來也不能忽視的事實——革命不能爲人們帶來任何改善的期望”^③。

可見凱因斯一開始便和馬爾薩斯主義臭味相投，正是充分地表現出他那衛護反動階級利益的決心和他在理論上的極端膚淺庸俗，甚致連後來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熊佩脫也不得不認爲：凱因斯把“人口過剩”看作是二十世紀初期的“重大問題”或至少是“重大問題之一”，這種看法，即使是“最愛護凱因斯的人”，也是無法對之原諒的“鹵莽輕率”，這是凱因斯的“最不妙”的論斷，^④隨後的事實證明，

① 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PP 4, 228.

② 馬爾薩斯，“人口論”第二卷，轉引自布留明著“現代英國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批判”（中譯本），頁44。

③ 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P. 296.

④ Harris, "The New Economics", P. 81.

資本主義總危機發展中的矛盾的複雜化和深刻化，是遠遠超出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所能掩飾的程度了。當凱因斯寫上述著作的時候（1919），他還認為相對於歐洲大陸來說，英國的情況還是比較樂觀的。據他的估計，戰爭並未影響英國的實際財富，^①事實上，在1920年年中以前，由於英國向第一次大戰的戰敗國家勒索的巨額賠款，在工業中引起的暫時繁榮維持着較高的就業水平，^②可是繼此以後，英國生產停滯和失業上升的趨勢就非常明顯了。1921年初陷於完全失業的人數達一百萬左右（這對英國說來是一個觸目驚心的數字），到1922年中又陡升到一百五十萬人。從1921—29的八年中（除1924年是例外），英國的完全失業人數每年都沒有低過於一百萬人。一直到這時，凱因斯才開始感到以前的傳統經濟學家所謂的資本主義制度的“自動調節”作用，似乎有些失靈了。他於是試圖從當時英國政府的金融政策，物價工資關係，國際政治環境、對外貿易等許多方面的表面現象中，去探求長期失業的原因，而把所有這些方面的“原因”，最後歸之於戰後經濟制度的“暫時的失調”。但是到這時候，凱因斯仍舊沒有放棄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的觀點。在1923年凱因斯和另一位英國經濟學者卑弗利支（後來成為凱因斯主義者）進行過關於長期失業現象是否由於英國“人口過多”的論戰。他仍然認為戰後工人憑藉工會組織，要求“超過經濟條件所允許的過高的實際工資”，是一種和“人口過剩”密切相關的“經濟失調”，因此認為馬爾薩斯的理論仍舊是正確的。^③可見凱因斯在從事經濟理論工作的初期，便把馬爾薩斯的反動人口論當作自己的基本經濟思想。

在三十年代的大變動時期，凱因斯感到有在傳統經濟學的廢墟上，重建一座保衛資本主義制度的“理論大廈”之必要。我們知道，馬克思差不多還在百年前就發現的資本主義積累規律，到三十年代越來越強烈地顯露出它的作用，龐大的資本積累所招致的利潤率降低，生產萎縮和大量失業，經濟危機的廣度和深度的增加等等嚴重現象，越來越清楚地呈現在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的眼前。特別使他們感到憂慮和恐懼的，便是一次經濟危機爆發以後的巨大的失業現象，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個絕對的威脅，因為這不僅大大地幫助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思想的傳播，尤其是

① 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P. 253.

② 約翰·穆勒“1926年英國總罷工”（三聯譯本）頁16.

③ Keynes, "Is Britain Overpopulated?" 載 New Republic, Vol. 36, 1923年10月號，P. 247.

到了三十年代，在工人階級的面前，已經出現了一個與危機重重的資本主義制度恰相對照的，日趨繁榮的社會主義制度。在這種情況之下，作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忠實的擁護者和保衛者的凱因斯，既不能再像資產階級古典學者們那樣讚美資本主義的進步性，而不得不承認這一制度的某些重大的“討厭的缺點”，但是同時又不得不堅決地反對馬克思主義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精深的科學解剖。因此他的所謂“新體系”，對待資產階級傳統經濟學的態度，一方面就是從“實用主義”的觀點，對於資產階級經濟學中的某些不合適的理論（如賽依的市場論）予以抨擊，抓住資本主義制度的某些明顯的矛盾，進行表面的分析；而同時更重要的是，必須從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去否定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中一切帶有科學因素的東西。這樣很自然地，又使凱因斯的注意力從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轉移到他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的著作，特別是馬爾薩斯在1820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從庸俗經濟學者凱因斯的眼光看來，馬爾薩斯這些著作的寫作背景——十九世紀初頻頻出現經濟危機的英國，竟是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英國乃至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所面臨的經濟情況是如此地“相似”，而且還看到馬爾薩斯在他的著作對里加圖的勞動價值論和資本積累理論的攻擊，可以被利用為抵制馬克思主義的武器，而馬爾薩斯的“有效需求”的理論又似乎可以用作“克服”經濟危機的工具。於是，所謂“凱因斯經濟思想的革命”，便在馬爾薩斯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的“藍圖”基礎上，以“革新”的和擴大的姿態出現了。在這裏，凱因斯不僅廣泛地搜羅了其他許多有代表性的庸俗經濟學的理論加以剪裁拼湊，並且把從二十到三十年代中資本主義在“克服”危機和失業方面若干重要的實踐（如英國路合、喬治時期的“公共工程”政策，美國羅斯福時代的“新政”等等）也歸納為他的“新經濟理論”的一部分。^②

-
- 凱因斯曾在20年代建議當時英首相路合、喬治採用“公共工程政策”來逃出危機，以達到“充分就業”。1929—33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羅斯福在美國實行“新政”政策對付危機，凱因斯感到很對胃口，即於1933年在美國“紐約時報”發表了一封致羅斯福總統的公開信，支持他的政策。1934年他并到美國白宮親自謁見了羅斯福總統，想作進一步的獻策。所有這些政策後來都成為凱因斯“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的理論組成部分。

(三)凱因斯的“通論”和“馬爾薩斯”的“原理” 及“有效需求”理論

馬爾薩斯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在1820年出版前幾年，英國遭遇過數次規模頗大的經濟危機。在1815年長期的拿破崙戰爭結束時，英國即遭受了一次嚴重的工業危機和農業危機，許多工廠和農場因物價猛跌，利潤低落而停閉，大批工人遭到解僱和工資削減。危機後的蕭條一直拖到1819年，而臨到這一年，新的危機又爆發了。因此在1819年前後，在庸俗經濟學家馬爾薩斯，賽依、古典經濟學家里加圖和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西斯蒙第之間，展開了一場激烈的關於經濟危機的論戰。^①馬爾薩斯由攻擊里加圖和賽依的危機論而擴展到對里加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的原理”一書的體系作全面進攻。因此在1820年發表了上述著作。馬爾薩斯自稱為這一著作是研究“在1815年後勞動階級不幸遭遇問題上的經濟原理的應用”。^②

馬爾薩斯認為在1815年後勞動階級的普遍失業，並非像當時有些經濟學者如里加圖等所主張的那樣，好像是由於“資本積累不足”所形成；他認為恰恰相反，乃是由相對於所謂“有效需求”不足的“資本積累過剩”所造成的結果。所謂“有效需求不足”是表現為全社會的國民收入不高，消費需求不足，以致利潤低落而不穩定，影響產業投資的停滯和破產。在這種情況下，要是仍然繼續提倡節約儲蓄，其後果將如在已經發生飢饉和向外移民現象的時候，仍然採取鼓勵人民結婚的政策一樣。^③一個國家如果達到了“有效需求不足”或“資本積累過剩”，以致形成了生產停滯的經濟危機，這時不應該是立即增加儲蓄來補充資本在危機中的耗失，而首先應該是提高國民收入，增加消費需求，促使利潤恢復和提高以後，才可以繼續增

① 1819年瑞士小資產階級經濟學者西斯蒙第出版了他的“經濟學新原理”，并在同年去英國會見了里加圖，批評里加圖支持賽依的“市場論”，從而否認生產過剩危機的看法是錯誤的，1820年馬爾薩斯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出版，參加了這一論戰，他支持西斯蒙第的意見，也批評了里加圖和賽依。因此馬克思指出：馬爾薩斯在他的“理論的進一步的引伸上，西斯蒙第又成了他的根據。”（“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三卷，頁61）。

② 馬爾薩斯，“政治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20），第七章，第十章。

③ 全上書，頁490—95。

加儲蓄來重建在戰爭中和經濟危機中損失的資本設備。^④但是馬爾薩斯認為由於社會上一般人們的“儲蓄和消費的習慣”，由於社會財富分配狀況的過於懸殊，“資本積蓄”或儲蓄增加的速度往往高於國民收入提高的速度，特別當產業興旺利潤很高的情形下是如此。^⑤這種情形反過來又會影響到消費需求的不足。因此，馬爾薩斯在這裏好像已經看到，僅僅依靠資本主義制度的所謂“自動調節”作用，是很難保證資本家的優厚的利潤和勞動者的較高就業水平的。因此，在必要的時候，馬爾薩斯認為應該依靠政府的力量，用征稅的辦法（在理論上也考慮到用發行公債的辦法），來適當地調整社會階級之間的財富分配狀況，來進行大規模的公共工程政策，以鼓勵不生產的消費等等手段來提高所謂“有效需求”（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才可以克服危機和解決失業問題。

簡括來說，第一，馬爾薩斯在上述著作中的主要研究對象，是企圖從理論上和政策上來“解決”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中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和失業問題。第二，他在理論上採取了從日常經驗出發的因果關係的庸俗分析方法，首先認為資本主義下的危機和失業的“真正原因”，是由於“資本積累過多”和“消費需求不足”，即所謂“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又是由於人們“固有的”消費或儲蓄習慣，也就是所謂社會的心理狀態；其次，“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便是利潤的低落，產業投資的停滯和破產以及大量失業。第三，形成失業原因的“有效需求不足”，既然被認為是社會習慣，是心理因素，而不被看作是資本主義制度基本矛盾的表現，那就不但可以在保存資本主義制度的前提下，謀求“解決”的辦法，而且認為應該通過資本主義國家機構的作用，採用一系列的政策，如租稅、公共工程政策等來“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從而“解決”失業問題。

現在我們再回頭來看看一百年後的凱因斯的著作“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吧。首先，這部著作的對象如作者自己所標榜的，是要從資本主義制度的“全局”來探討就業水平變動的理論問題，而實際上則是企圖為最後挽救資本主義的目的，妄圖從理論上來研究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嚴重失業現象的原因，並且提出可行的實際對策。在分析方法上，不但採用了馬爾薩斯的從日常經驗出發的表面的因果分析

● 馬爾薩斯，“政治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20），第七章，第十章。頁 506。

● 全上書，頁 465—66，重點系本文作者所加。

法，而且進一步把這些因果關係表達為各種煩瑣的數學函數公式。如果略去這些數學公式和某些部分不談，只就凱因斯“就業理論”的基本內容，特別是其體系的核心——“有效需求理論”來和馬爾薩斯的理論加以對照，我們看到二者有很大的共同性。凱因斯“就業理論”的簡單的基本內容是：他認為無論就單個企業或資本主義全社會來看，工人的就業人數是決定於生產品產量的大小，而產量的大小決定着企業的總收入或國民總收入的高低。國民收入中預期用之於消費的部分，和預期用之於投資的部分的總和構成所謂“有效需求”。由此，“有效需求”的大小是決定一國就業水平的高低的直接根據，從就業和失業的原因來看，他和馬爾薩斯的分析是一致的。

其次，他認為“有效需求”本身是可能隨着國民收入的提高而提高的，但是提高的程度常會相對地愈來愈小，他認為這根本上是由於一種所謂“社會心理”傾向，即當人們的收入提高時，他們的消費量雖然也隨着增加，但是增加的量會越來越不及收入增加的量。因此當國民收入繼續提高時，它和社會消費量之間的差額或空隙，也就會愈來愈擴大。這時如果沒有相應的投資量來填補這一個空隙，“有效需求”就會降低，從而最後使產品量和就業量縮減。

再其次，他認為在所謂“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要保證有繼續擴大的投資去填補消費量與國民收入之間不斷增加的空隙，必須有“投資的誘力”，也就是必須使企業家獲得他所“預期會獲得利潤”（凱因斯稱之為“資本邊際效率”），而他認為在自由競爭的情況下，當資本主義愈擴張，資本蓄積愈來愈多，有利的投資機會便將愈來愈少，因而“預期利潤”將要下降，以致“投資的誘力”減少，繼續擴大投資即將受到阻礙，終於會使“有效需求”低落，而致發生危機和失業現象。

最後，凱因斯和馬爾薩斯一樣，認為如果要達到和維持所謂“充分就業”水平，單靠資本主義制度自己的運行是不會有效的，必須採取一系列的人為的刺激——實行所謂“打氣”政策來提高“有效需求”，例如鼓勵大規模的寄生性消費來改變“消費傾向”；運用貨幣政策來壓低利息等以提高利潤率。刺激投資的擴大；由國家實行大規模的公共工程政策以及在必要時實行“投資社會化”來補充私人投資的不足等等。凱因斯認為只有採取這一系列的措施之後，才有可能達到和維持近似“充分就業”的“繁榮”狀態^①。

① 凱因斯，“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三聯譯本），第三章，第II節；第十八章等。

由此可見，凱因斯模仿了馬爾薩斯的體系，也是從資本主義制度下已經暴露的嚴重的經濟危機和大量失業的現象出發，推論出危機和失業現象的原因是由於“資本積蓄的過剩”，同時從反面來說，也就是由於“對資本主義需求的不足”，而後者又是因為社會“有效需求”的不足所形成的利潤低落所致。所有這些解釋，從表面上來看似乎並沒有多大不正確的地方，因為這都是資本主義矛盾所表露出來的現象的外部聯系。但是分析問題不應到此為止，真正科學分析的任務，在於深入這些現象的底層去揭露其內部本質的聯系。馬克思在這方面的科學的分析，正表明了它和馬爾薩斯及凱因斯的庸俗的解釋之間，有着本質的區別。因此像英國凱因斯主義者洛冰孫夫人那樣，引證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一句話：“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限制，是資本自身”^①，便圖據以論證凱因斯也和馬克思一樣揭露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真正缺陷——“資本積累”^②；這種說法是根本牽強附會的，我們知道，馬克思關於資本積累的規律以及與此相連的資本主義人口過剩規律、利潤率下降規律等的揭露，是從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間的對抗性矛盾的基礎上來闡明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本質，和它的必然滅亡的道路的。馬克思這種科學分析的核心是他所創立的剩餘價值學說。但是另一方面，馬爾薩斯和凱因斯關於資本積累、利潤降低、失業和危機等的解釋，卻完全是一整套以掩飾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和剝削實質為目的的庸俗辯解，而他們這種庸俗理論的核心則是前面所提到的所謂“有效需求”論，這也就是凱因斯和馬爾薩斯的庸俗理論之間의共同基石。

我們看到有些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不止一次地引證過凱因斯在1935年寫給肖伯納的一封信，在那封信裏，凱因斯表示他當時正在採取一種和傳統經濟學家不同的“革命”的手法寫一部經濟理論的著作（指“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並說這一著作的“重大變革”意義，將表現在“摧毀作為馬克思主義基礎的里加圖的理論”^③。可惜這些馬克思主義者，一般都只是從表面的意義上去理解和批判凱

① “資本論”卷三，頁297。

② Joan, Robinson, “Marx on Unemployment”, 載 Economic Journal, June—September, 1941.

③ 見哈羅德“凱因斯傳”，462頁，關於這一封信，蘇聯伏爾金著：“凱因斯是壟斷資本的思想家”（人民出版社譯本，頁12）及布留明著：“現在英國資產階級及政治經濟學批判”（三聯譯本，頁96附註①）中都引證，但是都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一句之後，刪去了“里加圖的理論”這幾個字，這應該說是批判凱因斯主義流於簡單化的一個疏忽的例證。

因斯的這一段話，從而放過了或勿視了它裏面所包含的真正的陰謀。實際上，我們看到凱因斯正是要把馬爾薩斯的“有效需求”作為理論基石，來企圖進行一石擊中兩鳥的攻擊。那就是既要拿“有效需求”理論去偷換里加圖的勞動價值理論，而同時則企圖“摧毀”馬克思在改造勞動價值理論的基礎上所創立的科學的剩餘價值學說，最後企圖藉此掩蓋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制度本質的科學揭露，特別是歪曲關於資本積累的規律。應該指出，攻擊勞動價值理論，是資產階級學者把毒箭射向馬克思主義心臟的惡毒手法。“資本論”剛一出版的第二年（1868），德國庸俗經濟學的一個代表便這樣寫道：“駁倒價值論是反對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務，因為假如同意這個定理，那就必須承認馬克思以鐵的邏輯所做出的幾乎所有的結論。”[●] 誰都知道，馬克思批判地繼承了資產階級古典學派里加圖的勞動價值理論，而馬爾薩斯則是最早的也是最頑固地反對里加圖勞動價值論的庸俗經濟學者之一。

前面已經提到，馬爾薩斯在1820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向里加圖的理論體系展開全面的進攻，而首先把進攻的矛頭指向他的價值理論，因為里加圖把自己的全部體系建立在價值規律這個科學的合理的基礎上，以此為出發點，分析了利潤和資本積累的關係，但是由於里加圖的局限性，使他對價值規律的認識停留在形而上學的觀點上，從而也就使他在利潤和資本積累的問題上遇到了絆腳石。我們知道，里加圖本來企圖在價值規律的統一基礎上處理利潤問題，他認為依照價值規律，商品是按價值來售賣的，而價值是由生產商品時所耗費的必要勞動量來決定的。在商品價值中必須要補償作為勞動者必要生活資料的價值的工資部分（實際上就是勞動力的價值），剩餘的部分才以“利潤”的形式歸資本家所有，換言之，從里加圖看來，“利潤”是商品的價值減去工資以後的餘額，從而認定工資與“利潤”的變動成反比例。實際上，里加圖在這裏所談到的“利潤”如果是當作“剩餘價值”來理解；“利潤”與工資之間的關係，當作剩餘價值的佔有者資本家和剩餘價值的創造者工人間的對立關係理解，原是相當正確的，因為剩餘價值正是從勞動所創造的價值中減去勞動力價值以後的餘額。可惜里加圖和所有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者一樣，不可能進一步去發揮真正的剩餘價值的範疇，相反地，卻從現象上把剩餘價值和利潤混同起來了。由於這樣，當里加圖再一步分析到資本積累對於利潤率下降的影響，分析到資本主義下的就業和經濟危機時，就犯了一系列的錯誤。

● 馬恩全集，俄文版，第十三卷上冊，頁269。

里加圖錯誤地認為資本積累愈多，社會對勞動的需要便愈會增加；對勞動的需要愈增加，便會由於競爭的作用促使工資上漲；於是依照上述“利潤”與工資成反比例變動的關係，利潤就會下降。里加圖在這裏是假定轉化為資本的剩餘價值的積累部分，總會成比例地由生產的勞動者來消費，這是里加圖在資本積累問題上所犯的第一個嚴重的錯誤，因為按照他的這種假定，那就無異於說，轉化為資本的剩餘價值都會成比例地轉化為可變資本（工資）！而他不知道隨着資本積累的增加，可變資本的比例會相對地愈來愈小，馬克思指出這是“再大沒有的錯誤”[●]，因為按照這種假設，資本積累就不會促成資本主義下的相對人口過剩。

其次，里加圖認為由對勞動的需要增加，競爭加劇，工資上漲所致的利潤率的下降現象，只是暫時的，不會最終損害資本蓄積的動機，不會阻礙社會產生。因為他認定“資本增加，同時賴資本而舉辦的事業，亦必按同一比例而增加。”里加圖又接着說：“關於這一點，賽依的說明，最令人滿意。他說需要只受限制於生產，事實上，沒有不可使用的資本……生產者非消費自產的商品，即消費他人的商品。他知道，他若要享受別種物品，最好是生產什麼物品。沒有人要的商品，決不會繼續生產[◎]，‘這是里加圖在關於資本積累問題上所犯的第二個錯誤，因為他把為利潤的目的而進行的資本主義生產，混同於為消費的目的而進行的一般的生產，因此錯誤地依附了賽依的庸俗的“市場理論”，認為“供給”總會在任何時候都為它自己創造着“需要”。認為一切的商品都是為着消費而生產，因此任何上市的商品都不會沒有人去購買，既然如此，他認為就不可能會發生一般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了。

第三，里加圖在解釋由於資本積累所致的利潤率下降的長期趨勢的時候，他又犯了另一個錯誤，就是把資本積累和他的地租理論中的“土地報酬遞減律”聯繫起來，認為隨着資本積累增多和人口增加，社會上愈來愈需要耕種劣等土地。由於“土地報酬遞減律”的作用，會使“追加資本僱用追加勞動所必需的追加食糧的供給，將益感困難”^②。因此他認為糧食價格將長期上漲，工資將隨之上漲，根據上述工資與利潤的反比例的變動關係，這當然會迫使利潤率下降，當利潤率下降到所

● “資本論”卷一，頁738。

◎ 里加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的原理”，中華書局1936年郭王譯本，頁225—26。

② 同上

謂極限時，不但資本蓄積會停止，甚至人口的增長也會停止。馬克思針對着這一點指出：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在“對於利潤率下降所懷的恐懼中”，“像里加圖那樣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絕對生產方式的經濟學者，在這裏，也覺得這種生產方式自己創造了一種限制，並且因此不把這種限制歸因於生產，而是把它歸因於自然（在地租學說上）”^①。

馬爾薩斯在上述的里加圖的利潤理論和資本積累理論中，從現象上抓住了里加圖的兩個漏洞。第一，馬爾薩斯認為利潤不是決定於工資，而是決定於資本的數量，他從顯而易見的平均利潤率出發，認為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下的各個企業或生產部門，不論它們各自所僱傭的勞動人數從而所支出的工資的多寡，只要它們所投下的資本數量相同，他們便總是會獲得相等的利潤率。因此馬爾薩斯認為與其說“利潤”是決定於工資，或者說在長期是決定於受土地自然肥沃程度所支配的糧食價格，倒不如說是在有限的時期內（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一百年），是受“資本的相對的豐裕或稀少的程度”所決定的，也即是受“資本競爭規律——供求規律”所決定^②，他說：“任何一種利潤理論，如果不考慮到供求和競爭原理，它便不會獲得正確性”^③。其次，馬爾薩斯抓住里加圖的第二個弱點，便是認為里加圖不該支持賽依的“市場理論”。前面提到，按照賽依的“市場論”，生產與消費這兩方面，亦即供給與需求這兩方面永遠是適合的。既然供給永遠等於需求，那麼就不會有什麼資本過剩，當然也不會有所謂生產過剩，從而更談不到會有什麼供求規律來影響資本及其利潤的事情了。但是馬爾薩斯認為這些根據及其推論都是不合事實的，因為從歐洲發生的 1810—1819 年中的三次經濟危機來看，不但的確有很多無法利用的資本，而且顯然有大量賣不出去的商品。

馬爾薩斯認為里加圖之所以發生上述的錯誤，在根本上是和他所主張的勞動價值理論有關。因為如果按照里加圖的說法，商品的交換價值只是僅僅由生產時所耗費的勞動量來決定，那就必然會認為工資是影響利潤的唯一原因，會以為利潤是由勞動所生產的商品價值中的扣除額。馬爾薩斯從而認為這種見解是不正確的^④。同

① “資本論”卷三，頁 287。

② 馬爾薩斯，“政治經濟學原理”（1820 英文版），頁 317；325—26。

③ 馬爾薩斯，“政治經濟學原理”，頁 336。

④ 全上書 56。

時，如果像里加圖那樣，認為商品是按照它們各自生產時所耗費的勞動量來進行交換，那也就會很自然地去支持賽依的理論，認定生產是需求的唯一來源，從而會以為某種生產的局部的生產過剩，正是表示那些可以和它交換的別的商品生產的不足，因此普遍的生產過剩彷彿是不可能發生的。馬爾薩斯認為這種理論正是違反了普遍的供求規律^①。因此他極力否定里加圖勞動價值論，指出商品的交換價值不能僅僅只是由生產中所耗費的勞動量來決定，而應該是由生產商品時，工人現投進去的勞動，加上幫助工人來進行生產的其他墊支資本（如生產工具，原料等，他稱之為“過去蓄積的勞動”），再加上市面通行的利潤率三者來決定。這實際上也就是生產成本加平均利潤的生產價格。很明顯，在這裏，馬爾薩斯只是從里加圖的價值理論未能解釋生產價格，從而捉住了他的矛盾。因為里加圖之所以不能把利潤和剩餘價值區別開來，正是由於他對價值規律的形而上學的理解，不知道價值規律到了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是以生產價格規律的形式在起作用了。因此當他分析到資本的構成，和資本的週轉速度等對於商品的價值所可能發生的影響的時候，也即是當他看到商品按照其生產成本加平均利潤來出售的時候，他極力企圖縮小這些影響，把這些影響看作只是價值規律的例外，並不會在根本上動搖價值規律。但是馬爾薩斯卻從現象上否定了里加圖，很容易就指出商品的交換價值是由生產成本加平均利潤來決定，這不是理論上的什麼“例外”而是資本主義市場上的實際普遍現象。

馬爾薩斯既然認里加圖的價值論和利潤論是違反了“供求原理”，於是他便從表面上所看到的，商品按照生產成本加平均利潤出售的現象，推論到供求關係不只是決定商品的“市場價格”，它也決定所謂“自然價格”（交換價值）和利潤。馬爾薩斯指出，所謂“生產成本”用一個統一的術語來表示，也就是“墊支資本”。但不論稱為生產成本也好，稱為墊支資本也好，它們之所以能夠影響商品的價格，馬爾薩斯認為並非根據構成資本的物質因素中的“內在性質或效用”來起作用，而是通過市場上這些資本和產品供給的數量，相對於需求的關係來起作用^②。如果就較長時期全社會產品的交換價值（自然價格）來看，馬爾薩斯認為決定利潤高低的，是相對於人口數量的資本量的多寡，如果資本積累速度超過人口增加的速度，即資本積累數量過於豐裕，利潤率就會下落；反之，資本數量相對於人口來說顯得

① 馬爾薩斯，“政治經濟學原理”，頁353。

② 馬爾薩斯，“政治經濟學原理”，頁78—83；頁103。

稀少，那麼利潤就會上漲。顯然這是受資本的供求關係所支配^①。其次，就較短時期商品的交換價值來說，利潤的大小是決定於商品的賣價與它的生產成本（墊支資本）之間的“差額”^②。當對商品的需求數量超過商品的供給數量，物價就會上漲，利潤隨之提高；相反，當需求落後於供給，價格就會下落，利潤也隨之下降。於是，馬爾薩斯就拿所謂“供求規律”來代替了里加圖所表述的價值規律，把供求關係看作是政治經濟學中的“重大原理”。同時也從供求關係中提出所謂“有效需求”的概念。他認為在供求關係中，是“需求”在起主導作用，而“需求”並不會如主張“市場論”的賽依所說的那樣，好像在任何時候都會自動地等於供給。“需求”如要成為“有效”，必須是那種“願意的和有能力的購買”。他認為只有通過“有效需求”才能保證繼續不斷的生產，才能保證資本家所“必須”取得的利潤。因此全社會的總財富的生產和其個別部分一樣，都是受“有效需求”所支配的^③。總之，“有效需求”理論乃是馬爾薩斯全部庸俗體系的基礎和核心。

由此可見，馬爾薩斯向里加圖體系的進攻，雖然也捉住了它的某些矛盾，但是揭露的方法，卻是從顯而易見的日常經驗出發的庸俗方法，去批評里加圖的科學的抽象方法^④，這樣當然不可能科學地解決里加圖體系的矛盾。相反地，只能是得出庸俗的結論。可是馬爾薩斯的後繼者——凱因斯卻十分誇獎馬爾薩斯的這種庸俗手法。凱因斯認為：“由於馬爾薩斯總是從非常接近於故事的結論的地方開始，因此就能更牢固地把握在現實世界中可能發生的事物^⑤”。凱因斯也表示他自己“非常同情這種方法，因為它比之里加圖的方法更易引導正確的結論”^⑥。他又說：“里加圖是一個抽象的、先驗的理論家，而馬爾薩斯則是一個歸納的、直觀的研究家，

① 馬爾薩斯，“政治經濟學原理”，頁103；頁334—35。

② 全上書，頁345。

③ 馬爾薩斯，“政治經濟學原理”，頁417。

④ 馬克思曾讚揚過英國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里加圖所使用的抽象方法，指出這是一種揭露內部本質聯系的“生理的方法”。但是也同時批判了這種抽象方法是不夠的，因為它不是辯證法，而是同形而上學的方法緊密結合的。參考“剩餘價值學說史”（三聯版）第二卷，頁4—5，頁9等。

⑤ Keynes, “Essays in Biography”, P. 123.

⑥ 全上書，頁122。

他討厭從可以根據事實和他自己的直覺獲得驗證的東西離得太遠”^①。“可見凱因斯對馬爾薩斯的庸俗經濟學方法論備極讚揚吹噓。

根據馬爾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認為構成“有效需求”的主要的消費者，乃是社會上的土地貴族和向國家及教會領受俸祿的人們，來擔當起濫費的任務，擔當起為資本家實現利潤的任務！可見，除了根據他自己的階級立場來維護當時的寄生性消費階級的利益外，在理論上是剽竊了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西斯蒙第的論點，認定“消費不足”是造成利潤低落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最後原因，想藉增加不生產性消費來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矛盾。列寧把這種庸俗的危機理論和馬克思的科學的危機理論——以生產的社會性和占有私人性之間的矛盾來解釋危機的理論加以對比，駁斥了這種庸俗理論的反科學性，指出：“這兩種理論都用經濟制度本身的矛盾來解釋危機，然而在指明這一矛盾時卻分道揚鑣了”。“因為”消費不足在各種不同的經濟制度中都存在，而危機則只是資本主義制度的顯著特徵”。因為，馬克思的危機論是認為危機的根源是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條件的本身，而馬爾薩斯(和西斯蒙第)的理論則認為危機的根源在於生產之外^②。總之，馬爾薩斯是把資本主義社會的利潤，生產、就業等等，看作是由社會的絕對的消費力，即超越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外的“有效需求”來決定。馬克思曾經正確指出：直接剝削的條件和它的直接實現的條件，誠然是不相同的，前者受限制於社會生產力，而後者則主要受限制於社會消費力。但是社會的消費力“既非由絕對的生產力，也非由絕對的消費力決定，而是由那在對抗性的分配關係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消費力決定”^③。馬爾薩斯則恰恰是抽掉了這個“對抗性的分配關係的基礎”來孤立地談社會消費力——“有效需求”。從而認為這種“有效需求”對於利潤和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與就業具有超然的，獨立的影響和控制作用，認為只要掌握了這把“有效需求”的總鑰匙，就可以打開一切通向資本主義繁榮的道路，這當然是極端的無稽之談。而且拆開他的所謂“有效需求”這把鑰匙的“祕密”來看，也不過是什麼相對於社會消費力而言的“資本的相對的稀少性”和盡人皆知的所謂“供求原理”等等而已。

三十年代的凱因斯既讚揚馬爾薩斯那種從現象出發的庸俗手法，同時也基本上

① Keynes, "Essays in Biography", 頁 135.

② 列寧，“評經濟浪漫主義”（人民出版社），頁 35。

③ “資本論”，卷三，頁 290。

剽竊了馬爾薩斯這個庸俗經濟學的理论基石——“有效需求”理論。他認為資本主義的“毛病”也不過是積累與消費之間的一種自然的矛盾，即“消費不足”。例如他說：“資本不能離開消費而獨立存在……作為一種永久習慣的消費傾向的步步減弱，必然不僅將削弱消費需求，同時也將削弱資本需求”^①。“消費乃是一切經濟活動的唯一目標。就業機會必需受總需求量的限制，總需求只可能是由現在的消費與現在準備的未來消費所構成”^②。“現在準備的未來消費愈大，那麼愈難找到更多的未來消費來愈先準備，從而我們對當作需求來源之一的現在消費的依賴程度也會愈來愈深。然而不幸的是，當人們的收入愈大。他們的收入與他們的消費之間的差距也會愈來愈大，因此，要是沒有什麼新的辦法，那麼問題將無法解決，除非讓失業儘量地增加……”^③他的意思也就是說，如果不人為地想辦法，而聽任資本積累與消費需求之間的矛盾繼續擴展下去，其結果只會造成愈來愈大的失業和社會的貧窮。

爲了要給資本主義的這一個“難題”尋找解決的辦法，凱因斯在他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這一著作的序言中首先表明：他的這一著作，主要是研究那些使得社會總產量和就業總量發生變化的決定性的力量。而研究的方法，則必須把“供給與需求的相互作用”當作依據。他認為通過這種途徑，就“和我們的基本的價值理論啣接起來了”^④。可見凱因斯是完全步馬爾薩斯的後塵，爲了庸俗地辯解資本主義危機和失業等現象，一開始便把所謂供求關係當作基本的價值理論，來取消替代里加圖的勞動價值理論。凱因斯的這種手法，可說比之當年的馬爾薩斯的目的性更加明確，也就是從庸俗化價值理論這一基礎上，去企圖推翻由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所得出的一切科學的結論。在這樣一個庸俗的供求論的基礎上，凱因斯也追隨馬爾薩斯之後，在他的上述代表著作的第二章，又以攻擊早給駁倒了的賽依的“市場論”——“供給會爲自己創造需求”的論點爲名來攻擊里加圖。然後緊接着就在第三章把“有效需求的原則”當作全書的理論基石或指導原則提出來，也就是他所謂要研究“社會總產量和就業量發生變化的決定性力量”。他根據作爲“基本價值理論”的供求原理，把社會的總產量和就業總量的變動，組織在所謂“總供給價格”與總

① 凱因斯，“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英文版）P. 106，（徐譯本），頁 92。

② 全上書，（英文版）P. 104，（徐譯），頁 90。

③ 全上書（英文本）P. 105，（徐譯本），頁 91。

④ 全上頁（英文本）序言，P. vii，（徐譯本），頁 4。

需求價格”的一種數學函數變動的關係中。並且從生產成本的概念和產品的“價值”的差額中引出资本家的“收益”——利潤，把能夠保證資本家取得必需的利潤而進行一定規模的生產的那種社會需求，稱之為“有效需求”。顯然，凱因斯把這種需求看作根本不受什麼資本主義剝削對抗的生產關係所制約，而是可以由人為主觀力量來控制，以調節資本主義生產和就業的一種外在力量。他和馬爾薩斯一樣，也是把“有效需求”看作是立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外的一種絕對的消費力。可是在他的著作中我們也看到，在馬爾薩斯這些庸俗經濟學觀念卵翼之下培育出來的凱因斯，一旦當他覺得好像自己的羽毛已經豐滿，可以在“理論的王國作獨立飛翔”的時候，他就認為自己已經遠遠超出他的老師了。在他的上述著作第三章的末尾他這樣寫道：“認為我們能夠平安無礙地不談總需求函數，這是里加圖經濟學的基本觀念，這也是百餘年來我們所受的經濟理論教育中極力被貫輸的觀念。馬爾薩斯的確曾經強烈地反對過里加圖那種認為有效需求不會不足的學說，但是沒有成功，因為馬爾薩斯除了訴諸日常觀察中的事實外，並不能清楚地說明有效需求如何及為何會成為不足或過多，他不能提供一種代替的理論；於是里加圖便完全統治了英國……馬爾薩斯曾糾纏不解的有效需求這個大難題從經濟學文獻中消失了……它只能躲躲閃閃地暗藏在卡爾馬克思……的下流社會中”[●]。

顯然，凱因斯在這裏對馬爾薩斯提出近乎批評的口氣，以代替他在 1933 年的“傳記集”中對馬爾薩斯的“功績”的大肆吹噓頌揚，一方面固然表示了他的妄自尊大，另一方面也足以說明，處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的凱因斯，面臨着馬克思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傳播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的威脅，也的確感到要真正提供一種“代替的理論”去“擊毀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單靠馬爾薩斯的庸俗經濟學是嫌太粗糙了。因為這種庸俗體系不但不能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真正“擊毀”馬克思主義，而且凱因斯也認為即使從“無可非議的邏輯上的結構”來說，也無法和作為馬克思主義基礎的里加圖的理論比美。因此這就迫使凱因斯根據總危機時期壟斷資本的要求，和壟斷資本主義的某些現象上的特點，對馬爾薩斯的庸俗經濟學某些重要構成部份的粗胚加以精細的琢磨，使其儘可能具有科學的外貌，特別是在馬爾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上，進行了細緻加工的工作，因為這是馬爾薩斯和凱因斯理論的共同基石，是凱因斯主義的“心臟”。（待續）

● 凱因斯，“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英文版）P. 32，（徐譯本）頁 33，